

新報人

2014年第八期
「六四」廿五周年特刊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刊物

六四 廿五



目錄

- 03** 編者的話
- 04-05** 八九六四 不能忘的歷史
- 06-07** 二十五年 沉冤未雪
- 08-11** 影像詩 定格六四
- 12-13** 電影正視歷史 反思自己
《沒有太陽的日子》導演—舒琪
- 14-15** 戲映「六四」 腦海烙下印記
-
- 16-17** 六四舞台 重「演」生命力
- 18-19** 六四文字夢 以文字記錄歷史
- 20-21** 薪火相傳 以藝術紀念六四
- 22-27** 廿五年抹不走的歷史
六四永久紀念館開幕
-
- 28-31** 自由花仍開 太陽花綻放
港台學運 25 年「薪火相傳」



編者的話

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四
一個世紀前，中國只差一步就可
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度，真正晉身成為繁榮富
強的大國。可恨的是，當年的當權者選擇殺
戮，粉碎了全中國人的自由夢。到今天，中
國淪為一個窮得只有錢的地方，當權者盡是
貪污腐敗，黎民百姓受盡欺壓。道德敗壞的
情況比25年前更嚴重。中國愈見保守，平
反「六四」的困難就愈高。然而，「六四」
這瘡疤不只是留在上一代人身上。雖然新一
代包括我未曾親眼見證89年的「六月飛霜」
，但坊間有不同的紀念方式向下代傳達「六
四」的真相和精神，本特刊的主題正是採訪
不同紀念「六四」的藝術和方式，希望為薪
火相傳略盡綿力。「六四」一日不平反，這
傷口會世世代代留在我們每人身上。我們相
信只要堅持，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
花，而歷史將會為我們作見證。

另外，廿五年後的今天在海峽的對岸，
台灣的學生也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可幸的是
悲劇沒再重演，雖然仍有流血事件，但「太
陽花學運」始終成功迫使國民黨政府正視民
意。歷史的寶貴就是它會不斷重複，好令人
類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今天的國民黨
雖然腐敗，但至少退還出討論空間，沒再成
為滿手鮮血的屠夫。但願對岸的共產黨早日
有勇氣智慧改過遷善，平反六四，還所有中
國人應有的民主自由。

八九六四 不能忘的歷史

4月15日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市民及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自發悼念胡耀邦，同時公開申訴反特權、反貪污、反官倒，要求與政府對話。

4月19日

學生赴中南海新華門外靜坐，要求與領導人對話。

4月24日

北京 35 所大學全面罷課；上海、西安、南京等城市均有響應。



4月28日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高聯）成立，提出「與政府直接對話」的要求。

5月1日

北高聯發表《致全國各界書》及《告香港同胞書》，呼籲齊心支持學運，要求政府坦誠、平等、開放地對話。

5月4日

五四運動 70 周年，十多萬名學生遊行至天安門，數百名北京新聞工作者加入聲援，全國各地響應。



4月18日

數萬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提出民主改革等訴求。3名全國人大代表會見靜坐學生及接收請願信。

4月20日

凌晨，公安以武力驅散新華門外學生，300名學生及一名香港記者被打傷。

4月26日

《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指學運是「動亂」，學生的活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

4月29日

國務院官員首次與學生對話，稱「四·二六」社論非針對學生。

5月3日

國務院拒絕北高聯早前提出的對話條件，指有海外反共組織在幕後挑動學生搞事。

5月13日

數千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

5月16日

絕食行動升級為絕水絕食行動，超過 300 名學生不支倒地。



5月17日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聲明：肯定學運愛國，呼籲同學停止絕食，聲言絕不「秋後算賬」。

5月19日

凌晨，趙紫陽到廣場慰問絕食學生；學生當晚結束絕食，改以靜坐形式請願。

6月2日

軍隊開始分批秘密進城，包圍廣場一帶。



6月4日

凌晨2時，大批戒嚴軍隊包圍天安門廣場，學生和民眾被趕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學生代表與軍隊談判，要求讓學生安全撤離。

凌晨4時，學生還沒撤出，廣場的燈全部熄滅，戒嚴軍包圍紀念碑。軍人以機關鎗瞄準學生。同時，大批坦克車和裝甲車由天安門衝向紀念碑，廣場上數百個帳篷及民主女神像被輾毀。

早上和下午，軍隊繼續向聚集的民眾開槍，傷亡人數難以估計。

5月18日

國務院總理李鵬會見絕食學生代表，雙方不歡而散。



5月20日

凌晨，李鵬稱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將學運定為動亂，宣佈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和新聞封鎖；廣場學生宣佈絕食抗議。

6月3日

戒嚴部隊不理民眾攔阻，強行進逼廣場，長安街死傷無數。

6月5日

軍隊仍在廣場駐守；北京青年王維林隻身攔截及攀上坦克。



(網絡圖片)

二十五年 沉冤未雪

1990

馬少方等多名民運人士被判囚。

1991

王丹等多名前學運領袖被判囚。

1992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及多名民運人士被判監。

於 89 年塗污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像被捕的喻東岳，於獄中寫了「平反六四」後毒打成瘋；也有異議人士在天安門廣場高舉「平反六四」標語後被送進精神病院。

1993

曾參與民運「北京之春」的秦永敏等人發表《和平憲章》後被判勞教。

1994

民運人士魏京生及任曉暉獲頒「羅伯特甘迺迪人權獎」。

1995

「六四」死難者家屬第一次以聯署方式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及公佈調查結果。



1996

劉曉波發表「雙十宣言」後被判勞教 3 年。

1997

回歸前的香港立法局通過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提出的「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必須平反」議案。



「國殤之柱」首次在維園足球場豎立。

1998

李鵬卸任總理，轉任全國人大委員長。

《時代周刊》選出王維林為 20 世紀國際政壇、革命事業最具影響力的 20 人之一。

1999

王丹發起「六四」十周年全球簽名運動，收集到來自全球逾 15 萬個簽名。

司徒華公開與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私下會面的內容，指董叫他們不要搞紀念「六四」活動。



2000

「中國人權」首次依國際公約向李鵬提出訴訟。一群「六四」死難者家屬組成「天安門母親」。

2001

香港多間大專院校歷史系學生聯署聲明，要求「六四」事件加入中學中史科課程。

2002

「六四」死難家屬發表聯署公開信，要求當局公正解決「六四」問題，並審訊當年的總理李鵬。

2004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指，仍有「六四」事件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在內地被監視。

2006

一位「六四」死難者家屬獲政府以扶貧為由撥款資助；「天安門母親」重申政治問題應由法律解決，並要求全國人大以專案方式討論、審議、決定「六四」問題。

2008

大陸 303 名學者、維權及各界人士聯署《零八憲章》，呼籲中共實行民主憲政。

2010

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民主女神像於「六四」集會後於中文大學擺放。



2012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王東海逝世。

2014

「六四」永久紀念館開幕前被指違反大廈公契。

2003

異見人士趙常青因發表「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而被起訴。

2005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指要求平反「六四」的人不能與中央政府溝通。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逝世。

2007

民建聯主席馬力發表「六四沒有屠城」言論，引來批評。

「維權網」報道仍有在 1989 年 6 月鎮壓後被捕市民至今仍在服刑。

2009

王丹等 60 名親歷「六四」事件人士發表民間《「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白皮書》。

劉曉波被正式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網絡圖片)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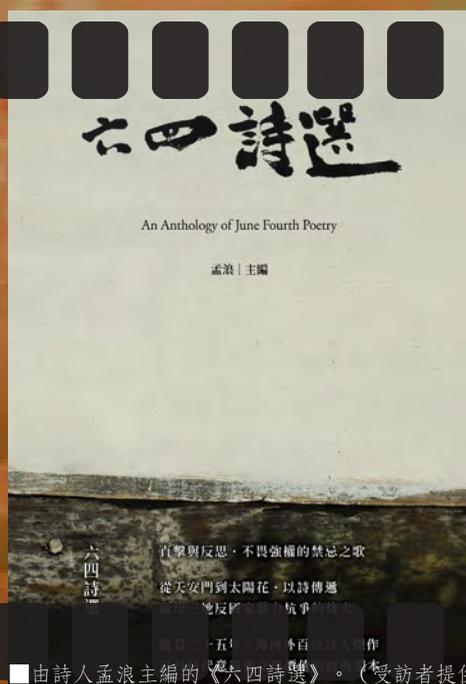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病逝。

2013

支聯會首次向公眾展示六四死難者證物。

(資料及相片來源：支聯會)

「打破禁忌疆界，伸展自由視野，讓記憶張口唱歌，讓目光編織對話」



影像詩

由華人民主書院及《六四詩選》編委會主辦的「六四影像詩」，主辦單位提供創作參考詩作十首，如也斯《靜物》、唯色《六月：長滿悲哀的雙數》、焦桐《老屋》及背景音樂，參選人亦可自撰詩文，配上影片、動畫，還原一切關於六四的情感面貌。

提供音樂版權作影像創作素材的，是台灣音樂家姚欣蓓，在「臉書」看到評審團召集人鴻鴻老師發起活動，姚欣蓓就毛遂自薦這四首歌：安寧神秘的「The Prayer」；笛聲傷感惘然的「空」；帶著溫柔的「Sakura」和氣勢磅礴的「Solar System」。「配樂就像一張有著淡淡顏色襯底的信紙，即使是同一首曲子，隨著故事、事件的不同，依然能為故事本身增添色彩。」

四首不同曲意 感懷六四

「『The Prayer』比較像一個從修行者，遠遠靜觀看著這個事件。」

她說對修行者而言，回顧過往，傷痛雖然不會再刺痛自己，但並非遺忘，因為事件本身是不會消失的。「『空』不停重覆的旋律，笛聲像引領我們回到無法遺忘的歷史情景。『Sakura』這首歌告訴我們，即使在絕望中也要保持希望，因為一定會出現曙光。」

至於「Solar System」原本是太空音樂，姚欣蓓想以更廣闊的音樂來呈現這個大時代中的重要歷史事件。

對於姚欣蓓而言，當時六四的情境仍歷歷在目。「六四發生在我的小學時期，還記得我們手臂綁著黑色絲帶，唱著歷史的傷口。現在我要透過自己的方式、用音樂記錄下來。」

「1989後，不寫詩是可恥的」

1989之後人必得寫下正義之詩，作為一種毋忘六四教訓的籲求——「一九八九之後，不寫詩是可恥的」《六四詩選》

《六四詩選》主編孟浪在六四影像詩的「臉書」提點參選者的詩作。他認為用現代詩歌形式寫「六四」題材不容易，「它需要對獻身理想和公義的感動與領悟，需要有一種撕開歷史幕幔、洞穿現實高牆、探向詩性精神之光的激情和衝動。」孟浪以詩人的風骨寄語年輕人，「每一個青年人都可能是詩人、都正是詩人。」

二十五年來執著於「六四」這個主題，孟浪深感這段被當局刻意遮蔽掩埋的歷史，有很多社會和精神層面的意義需要發掘和追索「作為一個時代良知的醒覺，轉型為歷史正義的精神彰顯，寫作價值就在於此。」

藝術團體「沒有製作」在二零一一年起籌辦六四報哀音活動，由第一年只有幾位成員到現在已凝聚百人，以大專生為主力，在六四前去不同區，以街頭表演喚醒路人對六四的關心。

把六四拉近生活

「沒有製作隊」將於今年六四街頭表演默劇，獻唱《沒有煙抽的日子》、《天與地》、《我們的烏托邦》。今年他們有感香港正值政改之年，希望以六四精神提醒港人關心身處的這個城市有什麼變化。籌委之一阿珊，慨嘆二零一四年香港面臨民主進程的挑戰、新聞自由被剝削，「香港人到底知不知道今年是香港充滿爭議的一年？三十年後這裏還是我們所熟悉的香港嗎？」



■結他手K是這次夾歌的靈魂人物，大家都隨著他的節奏唱歌。（鄭秋玲攝）



■參加者嘗試扮演當年學生絕食身體虛弱的情況。（何寶儀攝）

，讓影像與詩平行發聲。」

定格六四

昔六四情懷 今仍躍然紙上

孟浪憶述編選《六四詩選》時，讀每一首詩都深受觸動。「對每個寫下六四的作者來說，那些故事也許是作者一生的秘密，也許是沒有具體情節的片刻感覺、也可能是無法從記憶裡抹去的深刻意象，而幻化出撼動讀者的一個字、一組詞、一行句、一首詩。」在六四前夕他寫下了《軀體野蠻地向歷史衝去》，如今再讀，孟浪依然相信六四這段刻骨的歷史不會被磨平，從當年的天安門，到今日的「太陽花」、「和平佔中」都是這段歷史的傳承，「在我看來，當年北京學生和市民的那份熱血，也正在與台北和香港的學生和市民心裏同流著。」可是，一代代兩岸三地的青年仍然面臨「軀體野蠻地向歷史衝去」的命運。

就如一首詩所言

「但是，天穹頂部那顆高貴的頭顱呵／地平線上，誰美麗的肩頸在升起！」

——《連朝霞也是陳腐的》孟浪寫於1991年

二十五年過去，那些不懈奮爭的肩頸依然挺著。「天安門母親、當年廣場的學生、長安街上的北京市民……心中熱血依然、記憶不減！香港年輕的學生、每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上成千上萬的人就是新升起的身影！」

正當他們構思如何把紀念六四拉近到社會生活，讓聽眾得到思考及共鳴時，馬丁·尼莫拉墓上的一段話便給了他們靈感。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 我不說話……
他們奔向我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一人一六四故事

「沒有製作隊」隊員有年輕的九十後，也有四十多歲的成員，六四對他們可能只是聽回來的歷史、也可能是親身經歷的往事。背景縱然不同，但他們有著同一把要平反六四的火撩動心弦。



朱傑

1989年，正值十八歲年華。

曾經在六四後自發起推動民主教育組織的朱傑，二十五年來一直堅持參加悼念六四活動。每每談起當年六四死去的人，心仍悸動。「我經常諗，如果當年六四嗰啲人有死會係點呢？他們係北大、清華嘅國家精英，又有呢份勇氣、意識……我真係好佩服他們。」

朱傑相信他們這一代不會遺忘六四，「香港文化係好難

堅持做同一方式的事，年年悼念結果仲未平反到六四，所以體諒有啲人嘅態度變得平淡。曾經因為六四而驚醒，但各有各自忙碌，又靜落咗嚟。」他指出，即使對年輕人來說六四的片斷模糊、情感上未必有大大衝擊。但兩代人的共鳴在於「平反六四係一個歷史責任，是非要清楚、公義都要爭取。」



米米

1989年，才五、六歲。

當年還幼小的米米，直至到去教會才開始慢慢認識六四，「以前覺得又有人講又有人做就得啦！」明明住在維園附近，但無去過燭光晚會，「直至聽到曾蔭權，一個曾親眼目睹六四事件經過嘅人話『代表全香港』，我先意識到要做啲嘢。」後來發覺燭光晚會不止是宣洩情緒，而是一群人凝聚在一起互相提醒。他認為街頭表演悼六四可以勾起三、四十歲那代人的回憶，但內地旅客則視六四為禁忌，連他們的傳單也不敢拿。



阿珊

「1989年我未出生，不代表我不會知道。」

街頭報哀音，每位路人的回應都令阿珊很深刻，試過有公公、婆婆哭住感謝他們好好悼念這件事，也試過被人謾罵，「試過有伯伯夾雜粗言穢語鬧『你們都未出世知咩！』」不過阿珊堅定相信了解六四就好像讀歷史一樣，不在案發現場，不代表不能夠去感



■樂手「K」另組樂隊唱有關政治題材的歌。他指很多大機構拒絕用有政治意識的歌。（何寶儀攝）



■這是重演「王維林」擋坦克車一幕。（何寶儀攝）

■填詞人山卡啦指紀念六四的《五月三十五日》是自己最喜歡的作品之一。(何寶儀攝)



受。



阿K

「平反六四很重要，如果我不做點事，死去的墓會被刻上『罪人』。」

樂手阿K上網看六四影片、認識天安門母親的故事，了解二十五年前這件悲慟的事。「有啲流亡至今嘅人有家歸不得，佢哋背負嘅枷鎖又係為咩原因呢？」

他說現在不做，以後不知做不做到。「沉默係好愚蠢嘅行為！」阿K亦是「K3」樂隊的吉他手，寫很多有關回歸的歌。他無奈表示，現在有好多知名機構會查歌詞，有政治意味的不能唱，要求改歌詞，不改就不合作。但阿K淡然一句「我唔怕！我有自由寫我歌。」



曉慶

「口生於我，誰都不能掩我口。」

另一位樂手曉慶是一名社工，覺得「六四學生好蠢，點解唔等有權有勢先改變政府？但了解咗之後，先明白係佢哋喚醒其他人。」報了哀音兩年，見過直行直過無動於衷的人、放工買飲料鼓勵他們的上班族，又試過被警察驅趕，但他已習以為常，「可以捍衛就要珍惜，再過廿年先後悔就太遲。」



■參加者當中有熱愛攝影的人，為大家記下綵排的點點滴滴，各施其職。(鄭秋玲攝)

愛國就永遠放棄講舊時 六四過去經已沒爭議
別要講自尋煩惱 不需傾談自會沖淡成往事
誰又記起 而六四的每幕像民主之火熄了
今天眾人忘記 只得我懷念多麼諷刺

《五月三十五日》

二次創作填詞人「山卡啦」，你未必聽過這個名字，但他改編的歌詞卻道盡小市民心聲。一首嘲諷港鐵，只加沒減的《存心搵笨》、撐港視發牌的《發牌兒戲》、哀悼香港言論自由淪喪的《封咪》。在他筆下改編的歌詞，均以「新鮮出爐」的社會熱話為題，唯一例外的是紀念二十多年前的六四的《五月三十五日》。

愛國學校扭曲六四真相：學生有武器

原名陳凱洋的「山卡啦」是一名通識教師，直到二零一二年才第一次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六四時只有五歲，受的教育也沒有多提六四。只知六四死了人、屠城和幾個學運領袖的名字。」自小念親中學校的他，老師告訴他六四「是學生不對，因為學生中有搞事份子，他們身上有武器，所以政府才要出兵。」學校又誇大軍隊的死傷情況，播放經刪剪的版本。「幸好我是讀歷史，如果不是，我可以已經信了學校那一套說法。」

六四抹殺的 是國家希望

大學時朋友向他推薦網上的六四紀錄片，開啟對事件的了解，片中紀錄了由88年起學生提出的訴求、如何和中共領導人談判、談判過程失敗到學生流亡海外。看完以後才知道這不單是一場學運，而是一場影響了整個中國命運的運動。「學生不再談政治，不少國內的人都抱著賺夠錢就移民的心態。不再對國家抱有希望，這個國家完了！」

他參與了人生第一次的六四晚會，「八九年，三哥帶了一個民主女神像回來，二十多年後，我再次把她買回家。」

電影正視歷史 反思自己 《沒有太陽的日子》導演—舒琪



《沒有太陽的日子》是香港第一套以「六四天安門事件」為主題的本地製作電影紀錄片。導演舒琪從自己的家庭出發—他的大哥原定於1997年移民，但在六四事件發生後，便決定立即起行，充分表現香港人對中共政權的不安。此外，片中亦訪問多位名人，如歌手葉德嫻、導演張堅庭和侯孝賢等等，透過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反思自己的身份價值。

《沒》原非以六四事件為主

在《沒有太陽的日子》這齣戲開拍的半年前，日本電視台（NHK）想拍一系列的紀錄片，主要集中討論亞洲城市，而每個城市都會找當地人執導，當時舒琪就是代表香港的導演。適逢六四事件，他立即放棄原來的主題，「當時六四是全世界最觸目驚心的事，很多人都希望拍成紀錄片，但我當時未有拍紀錄片的經驗，需要請很多人幫忙」。然而，舒琪表示那時候大家的心態完全是同仇敵愾，毫不計較版權問題，互相協助做訪問。

「日本人一開始接受我原來的計劃，但六四事件發生後，我就跟日本人提出，希望將主題轉為六四事件」，第一次拍紀錄片，舒琪坦言沒有任何概念。過程中舒琪不斷追查有關六四的新聞，不停找資料約訪問，他給了日本人一張訪問名單後就立即開拍。

不打算拍續篇

舒琪回憶製作過程：「很自然的是，我一到剪接室，很快便有畫面出現，例如電影開首要有柴玲的講話，然後有一段舞蹈，再跳到天安門的坦克車畫面……我就是一邊剪接一邊構思整個電影架構。」電影總共拍了二十多個小時，但剪接以不多於三星期就完成。被問到日本人看畢電影的反應，舒琪笑言：「他們面都黑晒。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訪問都是沒有意思的，他們根本不明白訪問內容，也不認識他們，有什麼背景，所以他們只是隨意瞥過訪問片段，甚至覺得我在欺騙他們的金錢。」

事實上，拍了《沒》片後，日本人再度聯絡舒琪。九七回歸時，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有所改變，日本



歌手葉德嫻是舒琪的好友，她接受訪問時表示六四事件令她更關心世界大事。（電影截圖）

人問他有沒有興趣拍《沒有太陽的日子二》。但舒琪拒絕了邀請，他不希望只拍紀錄片，而是以一位故事人物表達中心思想，以戲劇的形式貫穿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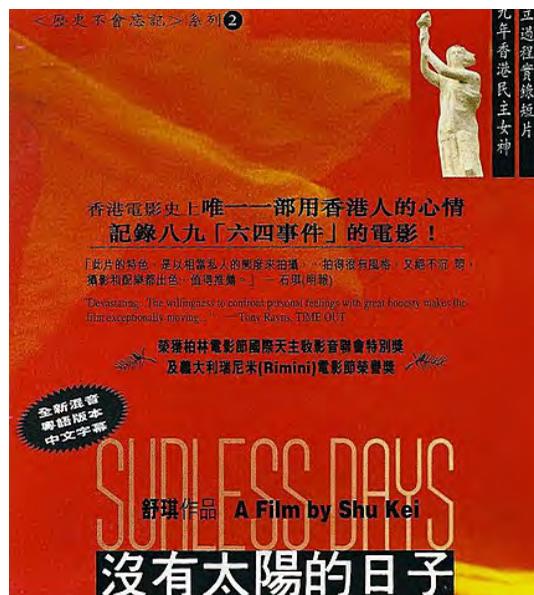
當年六四 港人衝擊大

六四事件發生後，舒琪指香港人的生活起了很大變化。他表示：「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和我一樣，十分關心事件的發展。一起床便打開電視台或收音機，經常和家人朋友互通電話，詢問天安門事件的經過？有多少傷亡？」舒琪又說，當時市民都十分留意新聞，不止是主要的新聞報道，下午和晚上的特別新聞亦會追看。一幕幕浴血的畫面，令他完全失魂落魄，舒琪開始反問自己，他還可以做什麼，「當時有很多情緒想表達，有憤怒的，有傷感的。基於自己是一名電影人，便想以紀錄片去宣洩」。

鼓勵年輕人：爭取被奪去的東西

舒琪認為香港的的政治、地理和經濟環境一直被人利用，左右派的言論衝擊本土文化。他感慨地指，「如果有青年人看了《沒有太陽的日子》，發現自己被打動，那麼你要問自己，為什麼被這部電影的情節打動」。舒琪認為有人被打動是好事，「這樣你才知道自己是個有感情的人，更應捉緊這個感動去改進自己，不要過一個汲汲營營的人生」。

他續指，香港的年青一輩有很長的路和時間，更不應害怕爭取公義。他又舉台灣學運領袖林飛帆為例子：「大不了就坐牢，我相信林飛帆即使要入獄，出獄後仍是一名大有前途的青年人；我當時也不怕，那麼還有什麼事情令青年人卻步？一定要奪回已經被人拿走的東西。」



《沒有太陽的日子》旁白有英語和粵語兩個版本，均由導演舒琪親自灌錄。（網絡圖片）

戲映「六四」

電影工作者常將本地的社會面貌搬進大銀幕，以影像記錄、傳達故事。由殖民時期至回歸後的香港，社會的大小事情，都能成為創作者的素材。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對中國政府來說彷彿就是禁忌，開拍有關「六四」電影無疑等於放棄中國市場。但香港仍有許多電影人，以擦邊球的方式，藉畫面記錄「六四」，讓下一代認識這段慘痛且不能被遺忘的歷史。

獨立電影《憂憂愁愁的走了》（下稱《憂》片）以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為背景，三條主線故事敘述當時的社會實況。戲內呈現創作者對「六四學運」、九七回歸、經濟發展、宗教和家庭的觀察及想法。



■《憂憂愁愁的走了》電影海報（網絡圖片）

人生就是憂憂愁愁

《憂憂愁愁的走了》來自聖經故事，故事描述一名富有青年，詢問耶穌需做多少善事才能得到永生，耶穌反問青年，他是否願意變賣所有財產分給窮人，最後，青年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擁有太多財富。

執導《憂》片的「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坦言，那名青年正是八、九十年代香港人的寫照，「為了賺錢，人不願理會更重要的事情。人擁有太多，就會放不下」。

崔允信表示，最初令他萌起拍攝《憂》片的原因，是兩則1996年的新聞：一則是中國政府單方面於香港成立臨時立法會，有民主派人士上街表示反對；而另一則是將軍澳東港城開盤發售，大批市民前往認購。兩則風馬牛不相及的新聞在同一時段相繼播出，令崔感歎，香港人在面對不穩政局之時，仍會繼續想如何「賺大錢」。

經濟發展 避談「六四」

據崔允信觀察，於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初談香

腦海烙下印記



■在北京胡同尋故人的一幕，呂國慧（右）飾演的Chris眼淚傾盆而下。戲中沒交代她有否尋回昔日戀人。崔允信解釋，他希望讓觀眾有思考空間。（電影截圖）



■崔允信透過觀察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將當時的實況紀錄下來。（相片受訪者提供）

港主權移交之際，香港社會亦出現動盪。當時港幣價值暴跌，更發生搶購米糧、銀行擠提等事件。但其後，經濟逐漸平穩。到了「八九六四」，市民反應很大，害怕香港回歸中國，當時更掀起短暫的移民潮。

不過，到九十年代至回歸前，經濟發展蓬勃，人們對社會議題不太關注，「金錢至上」的世界沒有太多的信念和堅持。崔允信指當時社會環境好，香港人有很多發展機會，追求物質生活。因為要「搵食」，香港人少談理想，避談政治，對於「六四」，更是少說為妙。

無視 不等於不存在

崔用了數年拍攝《憂》片，記錄香港各式各樣的重要事件。戲中有場景穿插真實的新聞片段，其中一段是「平反六四」。崔指縱使當時的香港人對此事不聞不問，但他仍希望透過電影，將「六四」記錄下來，讓將來的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認識及了解這段歷史。

《憂》片對「六四」的直接著墨不多，但其中一名女主角Chris卻有民運背景，故事講述她曾在北京讀書，後來「六四」發生而返回香港，她欲回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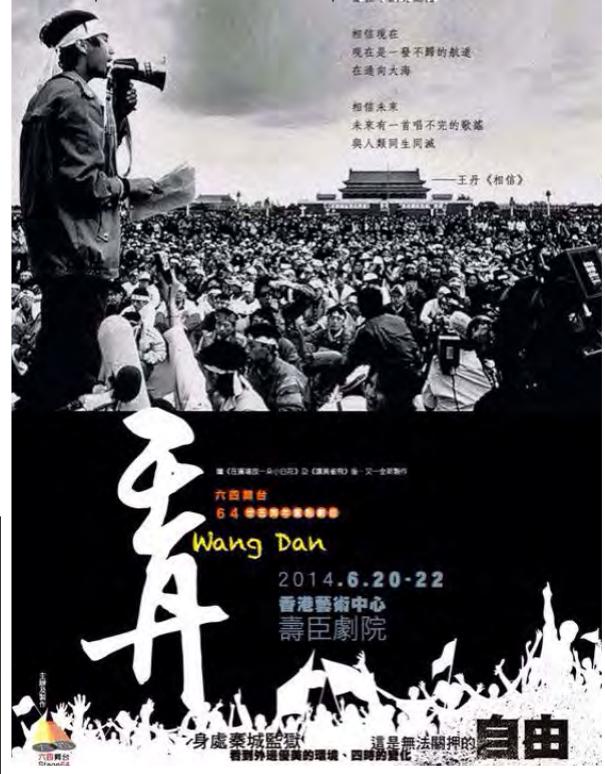
京尋找昔日戀人，可惜不敢重回舊地，不想回望過去。最後，電影沒交代她是否找回戀人。

崔允信表示，這設定是他故意安排的。他曾訪問經歷「六四」的北京平民，但他們普遍不願詳述當時的情景。因此，崔藉Chris好幾次畏首畏尾的態度，其不敢面對戀人、和「六四事件」的記憶，反映那些平民不欲回顧的心情，同時亦是港人對「六四」的冷漠。

主流風氣變 聲音單一化

《憂》片在2002年推出後，崔允信認為當時主流媒體接納這套獨立電影，「當時我們只做了簡單的宣傳，後來連電台節目都有談論。」他坦言，那時社會較多元化，主流亦較願意吸納不同聲音。

2008至2009年，崔允信拍攝另一部獨立電影《三條窄路》，感到社會的氣氛不同了。當時的文化產業是多元發展，即使大眾不關心，少數媒體仍可無顧慮地創作一些敏感議題的作品。但現時，主流媒體變得單一化，電影一旦加入政治或社會議題，更容易被邊緣化，亦「容易得罪人」。崔表示，「我仍然會創作更多獨立電影，刺激觀眾思考，反過來影響主流思想」。



■《王丹》導演李景昌指，選擇王丹為舞台劇主題，因為他一直沒有離開過市民的視線，人們知道他一直為六四事件奔走。（陳展希攝）



■《王丹》一劇的導演李景昌指六四的議題可連繫到香港現今的問題。（陳展希攝）



六四舞台 重「演」生命力

著名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活生生的舞台藝術能抓住觀眾的心，使觀眾真實體驗舞台上所發生的一切，在觀眾心中留下時間無法磨滅的痕。」一班六四舞台的成員，把六四搬上舞台，延續一份時間也無法磨滅的精神。繼《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讓黃雀飛》，今年六四舞台選擇以王丹——這位六四運動學生領袖為主題，訴說他的民運夢。



■《王丹》一劇的演員和工作人員討論劇本。(陳展希攝)



新劇《王丹》表現人性面

《王丹》一劇的導演李景昌指，「六四舞台在六四20周年成立，曾經三次以六四為主題創作劇目，已經建立了我們的訴求。來到25周年，不想硬梆梆地講政治法律，或口號式地叫平反六四，而是更著重表現王丹人性化的一面，希望引起觀眾的共鳴。」

為《王丹》一劇，演員、編劇、導演等一行六人到台北探訪王丹，各人異口同聲指，王丹其實也是普通人，有喜怒哀樂，有一般的好喜，李景昌指，「對一些走得前的人，我們或者會賦予英雄的印象，但人始終是人，並不是打不死的。」李景昌又指，王丹給了兩個很重要的信息他們，一是「薪火相傳」，二是「做有理想的事」。劇中其中一位演員何欣旅說她在王丹身上看到夢想之大，「當夢想夠大，要走的路就可以很遠，所以他（王丹）可以用一世爭取下去。」

心中公義 放上舞台

說到對六四的感覺，李景昌指這是「潛在係人心中的公義」，但這份公義容易會被歪曲和遺忘，「但藝術工作者不同的是更會面對自己，唔會呢自己，要追尋自己相信的公義」，喜歡藝術的人都以他們擅長的方法，如唱歌、肢體，表達他們對六四的感受，而李景昌則選擇手抱胸前。「至今我仍然相信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是公義的。」他肯定地說。

「我係王丹。」

在《王丹》一劇中，三位主角 | 都有一句對白「我係王丹」，王丹或許代表著一份精神，在這劇三位跨年齡和地域的演員身上，我們都看到他們對六四的精神。在劇中飾演成人王丹的邱萬城指，自己現在51歲，25年前也就是他25歲的時候，親眼目睹六四事件的發生，「我在八號風球上過街，喊過，和街頭的人一齊唱過歌，25年正好是一個double，希望自己可為這段經歷做一個總括，亦是時候展望如何薪火相傳下去。」

只有20歲，飾演少年王丹的林泳怡，和很多年青人一樣，沒有親身經歷過六四，她表示，中學有提及過，也曾跟從父母參與遊行，因此對六四有更深的認識。來自台灣，正在演藝學院修讀碩士的何欣旅指出，一開始看到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關心，感到很amazing(驚訝)，「或者民主的定義每個人都不一樣，但自由一定不可放棄。」

經歷廿五載 連繫現在

「六四講了25年，多多少少會有點盲目，但不代表可以不講，而是要令它重新活起來。」李景昌表示，六四的議題要有新的盛載，連繫到當今的問題，和當時同一的信念，「例如好簡單，當時學生反對貪腐，但現在香港一些高層官員都有懷疑貪腐的事，可看到當中的連繫，一些問題至今仍然沒有改變，更是變本加厲。」

舞台教育 讓六四相傳

李景昌相信舞台劇可讓六四薪火相傳，六四舞台由成立開始，持續每年到20至30間不同的學校上演《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讓學生知道六四的來龍去脈，了解事件。「六四舞台主要是想入學校做教育，而新劇只在一些特別、有象徵性的年度才會上演。」他又指出，「無教育，年青人或者會選擇不理，但當他們知道整件事，就好像一言驚醒夢中人，他們不是沒有感覺，而是需要深刻的教育。」邱萬城也指戲劇可以作教育的媒介，「戲劇可為人帶來一份感受，令人想知道更多，驅使人自發性地尋找答案。」

對於學校的自我審查，李景昌指一些學校的確不會邀請他們去演出，到過的學校數目亦不算多，但他對未來發展仍然保持樂觀，「學校知道我們六四舞台不是政治組織，只是做表演，會比較接受，而且現在互聯網普及，大陸、香港接觸自由、民主的訊息多了，唯有慢慢做。」他重申相信話劇，能讓新一代認識六四事件和延續六四的精神。

話劇，可以讓歷史重活，因為我們也不想時間讓歷史白活了一場。

「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簡單的一句話，道出無數人在 1989 年六四學運時的心情。文字的力量往往來得深刻和久存。二十五年來，本土文人以詩歌、散文、小說和評論，一筆一字的記錄當年六四發生的每一件事，將歷史保鮮。

■羅貴祥笑言現時已甚少寫詩了，若朋友邀請，仍會樂意奉陪。（陳家恩攝）



六四文字夢

香港，在整片中國大陸之中碩果僅存的自由土地，暫且尚有選擇紀念六四的自由、權利和空間。香港文學雜誌《字花》於 2011 年集結 130 首詩作，64 名作者，出版《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證明香港仍有許多有心有力的文人，願意揮動他們的筆桿，我手寫我心。今次邀約其中兩位曾出版六四詩、小說和散文的文人——崑南和羅貴祥，談談他們的「六四文字夢」。

文字功夫·銘記於心

選擇以詩敘事，崑南指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讓歷史歷久常新，「文學創作是需要咬文嚼字，每字每句都要『諗過度過』，所以一首好詩和一篇好文往往能夠深刻的留存在人心中，相反一張好的照片或電影，即使過了 10 年、20 年，也會容易被人遺忘或模糊」。

羅貴祥憶述 1989 年六四前夕，眼見同年紀的北京學生參與社運，他卻身在香港，頓時有種無力感。作為研究生的他，決定拿起筆桿，以自己最擅長的文字，寫詩文來抒發愛國之情，《名字的運動》就是他當年的作品。羅貴祥身邊更有朋友走到北京支援學生，種種方法表達港人對祖國同胞的關心，同時標誌港人從支援的旁觀角色，走入參與運動的主體。

一樣的時間。不一樣的時空

說起六四，兩人均記憶猶新。崑南指自己

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在家中電視機前看新聞直播天安門的情況，王維林用身軀擋坦克車一幕，使他不禁流下男兒淚。羅貴祥亦同樣表示難以接受，「當時很天真地相信，中國會有改革的機會。眼見群情洶湧，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學生在廣場集會的情況、悼念胡耀邦活動和遊行示威等，當時的集會更一度像嘉年華，人們唱歌、跳舞。怎會想到有天坦克車真的開進了長安大街，甚至將槍口指向人民」。當時各團體發起一個又一個的簽名聲援活動，羅貴祥亦決定以文字，寫下《名字的運動》，反思簽名的意義。

身體即使衰老 名字也不見得衰老
儘管它飄泊浮動 儘管它一開始便不屬於誰人
然而當一切資產都已經私有化了
他依然堅信唯有名字才投身這場公眾的運動

——節錄《名字的運動》 羅貴祥

六四情人·愛恨交纏

兩位文人，不約而同地於作品中，將「六四」比喻為愛情。崑南指他對中國的情感，就好比遇上的一位心儀的姑娘，外表姣好吸引，但接觸久了才發現她愈來愈多醜陋的地方；羅貴祥則認為談戀愛一般是愛恨交纏、糾纏不清；即使十年過去、二十年過去、二十五年過去，人民跟六四的關係依然是「記憶與遺忘的對峙」。



■崑南自五十年代開始創作，曾撰寫不同專欄，並先後創辦多份文學刊物。他與西西、蔡炎培同輩，為人低調。（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以文字記載歷史



■羅貴祥有關六四的作品，部分收錄在其詩集和梁文道《打開》的雜誌中，分別為《那時那節在耶路撒冷》和《六四不是談戀愛》。（陳家恩攝）



■《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由本地文學雜誌《字花》於2011年出版，結集兩岸三地共64位作家，收錄130首詩。（網絡圖片）



■梁文道創辦的雜誌《打開》，第二十期正正是六十四週年的刊物，內容詳細講述六四事件發生的經過。（陳家恩攝）



■崑南的第一本詩集《詩大調》，獲得雙年獎冠軍，內裏刊載其六四詩作《六四風景》。（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深夜
 三盞燈伸延到大三巴
 解構半幅殖民的地圖
 海盜不再 條約不再
 歷史也不再 不再流淚
 因太陽提前趕來
 這個城市不太壞
 這個城市不太壞
 因此你是你是我的愛

—— 節錄《回歸錄影帶》崑南

當大家認為平反是發夢。。。

六四學運發生至今經歷二十五載，見證過天安門事件的崑南和羅貴祥坦言不敢對「平反六四」抱有期望，不過他們仍堅持以創作記錄歷史。羅貴祥說：「至少讓我們下一代知道，甚麼是『六四』，明瞭發生甚麼事。」崑南亦慨嘆，「今天的中國已有太多不公義的事，六四只會漸漸被埋沒成為其中的一樁」。

但願今天的我們，不會將六四當成一個數字、一個符號。

「這種緊張經驗其實有點像熱戀，也有點像旅途中對即將到達的地方的熱切期待。對峙的張力，令血往腦上湧，能量提升到頂，逼使人產生興奮勝利的錯覺。」

—— 節錄 打開《六四不是談戀愛》羅貴祥

夢是做個正直的中國人
 夢是不殺同胞的中國人
 夢是奉獻給民族的中國人

—— 節錄《OH MY LORD THOSE FUCKING TWENTY YEARS》崑南

作家簡介

崑南，原名岑崑南，香港作家。早年曾在副刊撰寫小品文、詩歌和遊記。五、六十年代創辦《詩朵》、《新思潮》、《好望角》、《香港青年周報》和《新週刊》。曾以六四為背景，創作長篇小說《天堂舞臺足下》和詩歌《回歸錄影帶》、《六四的數字》、《六四風景》、《OH MY LORD THOSE FUCKING TWENTY YEARS》等等。

羅貴祥，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主任。著有小說集《欲望肚臍眼》、劇本創作《三級女子殺人事件》及翻譯劇《我們互不相認的一小時》。曾創作有關六四的作品，如包括詩歌《名字的運動》、《那時那節在耶路撒冷》和評論《六四不是談戀愛》。

六四事件踏入二十五週年，或許你會想，除了出席六四燭光晚會，還能用甚麼方法紀念？有八十後藝術家成立工作坊，用行為藝術、聲音藝術、電影放映會、繪畫等方法讓大眾透過藝術發表對六四的看法，思考六四的本質及意義。

薪火相傳 以藝術

除了燭光 我們還能做甚麼？

「這一代的六四」是由藝術家盧樂謙與幾位朋友於2009年成立，當年正是六四事件二十週年，他們認為每年六四燭光晚會好像「例行公事」一樣，根本表達不到自己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所以，他們另闢途徑，透過行為藝術，全身塗上象徵和平、希望及中國人的黃色油漆，用身體直接表達出六四的看法。「『這一代的六四』是另一個民間紀念六四事件的方法，希望參加者透過活動了解不同人對六四的感受，啟發他們思考。」

起初，「這一代的六四」是以行為藝術表達個人對六四事件的感受。每年的六月三日，他們也會在銅鑼灣表演行為藝術。盧表示，有一年他拿著一個坦克車形的鏡映照出身邊的人及其他行為藝術家的表演，意味著六四事件是一塊鏡，反映人的轉變，「好像梁振英由當年譴責六四事件但現在卻變成這樣，可見到人的轉變，也令人思考為何人會有這種轉變。」

其後，由於有更多非藝術界的人如教師、家庭主婦、的士司機等參與，盧便舉辦不同工作坊如坦克車製作、陶瓷、繪畫等。當中的坦克車工作坊是教導參加者製作坦克車，希望參加者可以把自製的坦克車放在全港不同區域，令更多人記得六四。電影放映會亦會播放有關六四事件的電影包括《天安門》、《頤和園》、《憂憂愁愁的走了》，讓更多人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有些八十後，甚至是那個年代的人都未必知道六四

行為藝術 聲音藝術 圖像製作 講故 坦克車 製作 工作坊 工作坊 工作坊 工作坊 工作坊 工作坊

除了燭光晚會，盧認為透過不同工作坊，也可以鼓勵大眾思考六四、表達己見。（網絡圖片）



紀念六四



除了街頭行為藝術，攝影工作坊向參加者分享當年相片，希望可以「重曝六四」。（網絡圖片）



人來人往的街頭上，盧樂謙重現王維林站立於坦克車前的一幕。（網絡圖片）



每逢6月3日晚上，志同道合的藝術家會在銅鑼灣的鬧市裡以行為藝術自由表演，向路人表達自己對六四的看法，沒有硬性規定表演模式。（網絡圖片）

的來龍去脈，希望透過這些活動令他們更明白六四的本質。」另外，聲音工作坊就是播放當年天安門的聲帶，讓參加者耳聽感受當年發生的情況。

認識六四 喚起對社會的關心

不少九十後也有參與「這一代的六四」舉辦的活動，盧樂謙認為這不但可做到薪火相傳，也希望他們能夠將了解六四事件成為關心社會的第一步，「他們接觸六四並不代表會為社會做一點事，但希望他們日後有能力時會為社會做更多。」盧稱當年六四發生時只有九歲，所以沒有任何感覺。直至大學才開始關心社會，了解當年發生的事。他希望可以令年輕的參加者對社會有一份責任感。

回歸本土 重演「碧街事變」

由於「這一代的六四」是獨立組織，只有緊拙的人手，所以每年盧樂謙也會自費籌備活動。為了避免每年活動相同，他會在Facebook邀請人義務協助。「不會期望要將活動舉辦得好大，最重要是對呢件事熱心，錢方面都係多有多做少有少做。」

踏入二十五週年，除了行為藝術之外，今年將會舉辦「碧街事變」的流動劇場。盧指，過往六四是在北京發生的事，今年會回歸本土，希望透過劇場讓大眾了解「碧街事變」。他們向油麻地街坊搜集暴動的資料，重演當年暴動的情況。



「碧街事變」的過程

1989年6月7日凌晨一時許，突然有示威車隊出現於油麻地碧街，隨後更有人焚燒雜物、破壞公共物品，其後警方施放四十九枚催淚彈，拘捕十五名人士。

六四紀念館

JUNE 4TH MUSEUM

必須旗幟鮮明也



蓮花池果



廿五年抹不走的歷史 六四永久紀念館開幕



六四事件 25 年，有人漫不經心，有人假裝忘記，有人念茲在茲。六四永久紀念館的成立，化身成那場血染的風采的影子，在鬧市中靜靜站著，向路人展示手中的歷史真相——這個約 75 平方的小房子載浮載沉著 16000 張相、100 多件文物、33 卷微縮菲林、500 本書、229 本雜誌，還有，25 年來的守候和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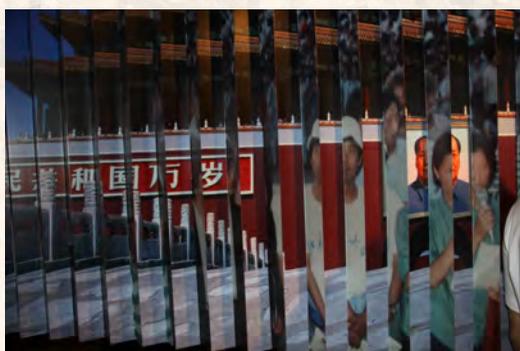
8 ■ 凹凸畫旁邊放置一尊由藝術系畢業生製作的六呎四吋高的民主女神像，供參觀者拍照。



6 ■ 穿梭歷史，體驗「六四」，參觀者最後進入白茫茫的狹道之中，伴隨「血染的風彩」的純音樂，思考民主之路何去何從。

每個中國人置身歷史面前，都無法避免六四的慘痛經歷，如何為中國的民主夢尋找出路，唯有從不斷思考中尋求答案。

9 ■ 以「迷宮」概念設計的圖書報刊廊，放置了與「六四」相關的書籍、雜誌、報章和單張等，供參觀者翻閱。



7 ■ 步出展覽區，右邊有一幅凹凸的「天安門廣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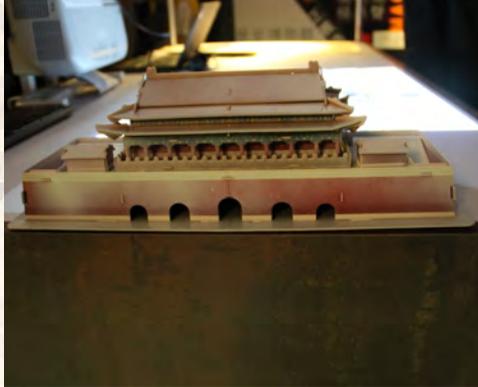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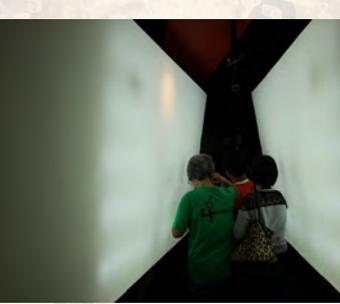
11 ■ 參觀者從紀念館離開時，會接觸到由投射機映出「平反六四」的字眼，寓意每個人面對歷史都無法逃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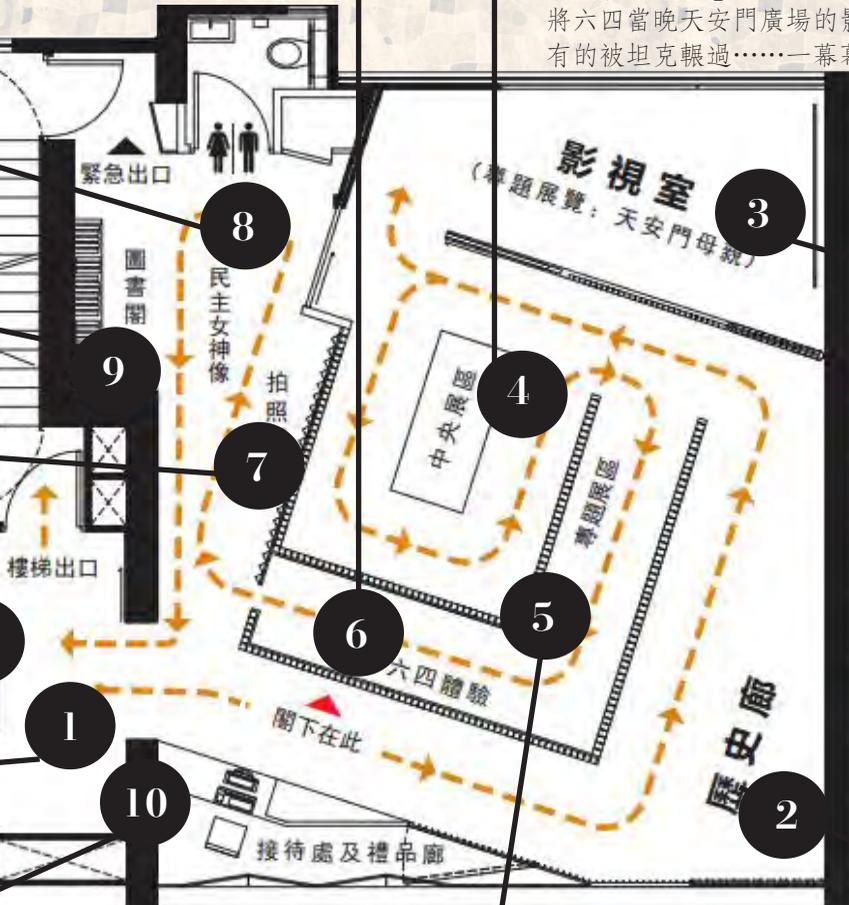
1 ■ 甫進富好中心，按下五字樓，升降機便帶你到六四紀念館——那保存着被內地禁制的回憶的匣子。



10 ■ 在接待處及禮品廊有民運書籍及紀念品讓參與者選購。



4 ■ 從影視室出來便是中央展區，是博物館的核心。展區中間懸掛的桌子放置「天安門廣場模型」、「六四」相片，讓觀眾可以親手「揭露」歷史真相。投影機將六四當晚天安門廣場的影像投射於桌上，有的學生抗議示威、有的頭破血流、有的被坦克輾過……一幕幕觸目驚心的畫面，沒有言語，卻最震撼人心。



3 ■ 影視室的專題展覽每半年更新一次。是次以「天安門母親」作專題，播放着「六四」及「天安門母親」群體《探訪紀實》選輯，道出她們平反六四的渴望。



2 ■ 走進紀念館，面前是一條「歷史長廊」，帶參觀者穿梭時空。首先佈景板顯示了歷年紀念「六四」遊行的橫額、旗幟的圖片及文字。反映廿五年來風雨飄搖，在時間的巨輪之下，人們未忘六四，為爭取民主自由孜孜不倦。



5 ■ 轉出中央展區，一條長廊反映出廿五年來「六四」的轉變。兩側互相對立的屏幕訴說廿五年來不同人士的變與不變。例如從左側反映「古」的屏幕中特首梁振英當年曾「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人民」；但從右側反映「今」的屏幕中，梁變成「特區政府不評論有關六四的事情」。

自政客不定的立場，民運人士廿五年來堅定的立場，六四「變與不變」顯而易見。而電視的螢幕上人物清晰與模糊的對比，指出他們廿五年來的「變臉」。

(平面圖由六四永久紀念館提供)

紀念館中， 還有他們……

紀念館義工朱世勳

那年我是一位西班牙文老師

沿著歷史廊一直走，來到轉角的白色房間，長長的房子投映著影片，影片中老婦坐在老式房子，悲傷而迷糊地吐著話，眼睛泛淚，眼角落下的是歲月烙下的紋路——她們是「天安門母親」。二十五年前痛失子女，二十五年後她們提到孩子仍然落淚。房子同樣有位老人，每當影片播映完畢，他就按下重播，使母親的眼淚不被遺忘。七十七歲的朱世勳：「我願把我僅餘的時間獻給了六四，我會一直等待平反那天。」

朱世勳在北京讀大學，1989 那年，他回流香港工作多年，白天做翻譯，晚上兼任西班牙文老師，現在朱仍在教西班牙文，一切看似沒大改變，但從知非之年邁進杖朝之年，二十五年光陰如白馬過隙，「過去再久，這筆債都要清算。」他眼神堅定，「那些被殺害的學生，流過的血都是證據。」

朱世勳參加六四晚會，從燭火中悼念國殤；第一屆六四紀念館成立，他摸道而行；因參觀後心中感動又在第二屆紀念館成立時擔當義工；現在六四紀念館終於找到永久的場地，他又幫手在影視區中操作影片放映——「紀念館應延續下去，讓更多人看見。」朱續說，「我可能看不見了，所以趁現在要多做點事。」說畢，他又按下重播。

紀念館民主女神像製作人阿珍 那年我十一十二

二十五年前，一尊白色的石膏像，手持民主之火，一腳踏前，聳立在天安門前，與毛澤東肖像對望。六四紀念館今年同樣複製了一尊由美術系畢業生共同製作的女神像供參觀者拍照留念，她們從用料到結構都重用昔日製法，阿珍解釋，這是為了尊重前人藝術，保留原有特色，薪火相傳。

1989 年，阿珍只有十一二歲，不諳世事，直到長大才恍然大悟。「記得 2013 年的六四晚會，雨下得大，眼見雨水浸至腳下兩三吋只好離開，但在銅鑼灣走了一圈，聽見有人說可以回去了，又忍不住返回維園。」回去後，她看到黑壓壓的傘群，突然明白，有那晚撐著萬數支雨傘的是「堅定」。這份堅定使她聽見支聯會的邀請，沒聲答應。經過商量後，她 and 一班朋友上網搜集資料，搜查當年女神像的製作方法，不改製方，把六四的精神薪火相傳下去。「過程卻並非想像中簡單，從館內的氣溫、石膏的溫度、結構、支架，我們都得細細考慮，邊做邊作改善才有現時這個成果。」

女神像「入伙」當日，嬌小的她戴著帽默默在旁打點一切，瘦小的雙手造就了眼前偉大的民主女神像。「藝術系學生也可用藝術為正義和民主出點力。」她口中的政治不偏激，不醜惡，尤其溫柔。「人人心中都有一顆種子，有些人一早發芽，有些人尚在泥土中醞釀。」阿珍心中的六四不單純是政治事件，「它是我們心中的大是大非，是民眾對共同價值，是非黑白既堅持。二十五年等不到，就等五十年，最重要是我們記得，我們的下一代都記得。」

紀念館署理館長兼設計師林漢堅 那年我剛完成畢業論文

六月，蟬鳴，走在大學校園，處處黑影，畢業生穿著黑袍到處留影；那年，像現在的莘莘學子，他剛完成碩士論文，任教書先生與學生一樣等待著暑假到來——二十五年轉眼過去，今日他站在六四紀念館中，被傳媒包圍，流著汗，解釋展館的設計，他，是這個展館的設計人，林漢堅。

林擔任過許多展館的館長，他認為，六四紀念館和普通博物館不同，一般的博物館只是收藏史物，但這個紀念館不但收藏了許多與六四相關的書、照片、物品和影像，更秉持著「平反六四」的精神，「這份使命令這個紀念館更走近歷史」。

炎夏，林漢堅穿著西裝外套，熱得額角出汗，但他沒有擦汗，反而滿腹熱腸地說：「香港人光顧搵錢是不行的。當天的人流了血，才有現在繁榮的一面，我們才有各樣的民主運動出現。」

紀念館的中央從高處吊下一張四方桌，桌上故宮被「反轉」，有投影器不停投映六四的照片，觸目驚心，但地下卻是一片草地，幾個棉枕，震撼的真相下，有家的感覺——這是林漢堅最喜歡的一角。

支聯會常務委員鄒旻芳 那年我剛出生

紀念館開幕當天，有組織在館下示威，中外傳媒雲集，警察到場維持秩序，情況混亂，鄒旻芳小小的影子站在人群中，示威的人三字經聲聲入耳，她卻臨危不亂。頃刻，她回到紀念館的樓梯口接受記者訪問，沒有空調，大家一額是汗，她向記者索「糖」，原來她患重感冒，整天沒有一口水下肚，終於見暈……

鄒旻芳於1989年那年出生，在內地「保密教育」下，她從未聞六四。直至來港升學，十七歲那年看見新聞才初聞「六四」，「覺得很震驚，不信真有其事，那麼多死亡數字中央政府仍會隻字不提。」她四處找尋資料，一探真假，機緣下參加了支聯會的六四義工隊，後而成為支聯會常委之一。

二十五年過去，呱呱落地的嬰孩蛻變成為眼前的鄒旻芳——一個架著眼鏡，有成熟思維的成人，令人感嘆除了月光，時間似乎什麼都沒有留下。「對於25這個數字，許多人都會有一些感性的想法，但我對這個數字更多的是理性的角度。六四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起點，一個政治的起點，一個民主的起點，即便是六四晚會也是參與者的起點，我就是從這個起點，由十七歲的我走到現時二十五歲的自己。」

2008年，她由台下站到台前，擔任六四晚會司儀；2014年，又從台上走到館中，在病中「開夜車」。她坦言，十多歲時，為六四做剪剪貼貼的事，覺得自己做了一些實在的貢獻，但後來知道多了，做得多了，走出街被罵，上網又被罵，人心肉做，難免覺得灰心。不過，鄒慢慢明白這就是追尋一個理想，一個夢，一個精神價值時需要付出的東西。「用感性思考，當然會灰心，甚至有遠走高飛的念頭，但用理性去想，平反六四不應局限在感情的層次上。」那雙理性的眼睛在閃爍，「不要忘記，廿五年來，有一班人活在水火之中，當年那件事，不少涉事人仍在人世，不止他們，他們的後代至今仍被影響。」

因為這份理性，鄒旻芳說，她會一直走下去，「不要看少自己的力量，在自己崗位上盡力做對的事就是最大的貢獻」，說畢，她一頓，說：「我平時沒有那麼老土的，今天不知做什麼。」不消幾刻，她在人群中消失，轉身忙去。

自由花仍開 太陽花綻放 港台學運 25 年「薪火相傳」



24 天的台灣反服貿學運暫告一段落，50 萬「黑衫軍」走上凱達格蘭大道包圍總統府的畫面，令港人倍感熟悉。2003 年的 50 萬人七一大遊行，2012 年的 12 萬人上街反國教，醞釀中的「佔領中環」行動，都標記港人爭取民主的決心。

不少人會將「太陽花學運」和 1990 年的台灣「野百合學運」連繫起來，當時 6000 名大學生靜坐抗議爭取民主。而啟發「野百合學運」的因素之一，正是 1989 年中國暴力鎮壓的八九民運

1989 年 6 月 4 日，傷盡兩岸人心，港人陷入「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彷徨。

2014 年 3 月 18 日，反服貿抗黑箱，台灣人面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恐懼。

25 年前，台灣有學生到北京支持學生，當八九民運被無情鎮壓，台灣大學生回歸本土後，正視專權政治弊端，爭取一人一票選總統。

25 年後，台灣經已完成兩次的政黨輪替，把民主再向前推進。而香港，還在普選的公民提名問題上向中央力爭，苦等《基本法》承諾的普選。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不能成為第二個香港」，是「太陽花學運」叫得最響的口號，台灣民眾看到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不禁心存疑慮。當香港的學界還在激烈討論政改，反覆商討如何佔中時，台灣學生一夜間便佔據了立法院，這個「非預謀」的奇兵突襲，令反服貿行動得以階段性勝利，亦引發港人對「佔中」的熱烈討論，「台灣可以，香港為什麼不可以？」。

佔中「蓄勢待發」 台學運「出其不意」

現時的「佔中」處於醞釀階段，由向公眾介紹行動的理念，到萬人簽誓言書、商討日，滲透時間長，令人質疑是否「雷聲大，雨點小」。「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則以「煙花」和「壓力鍋」比喻太陽花學運及佔中的傳播模式。「太陽花學運像放一場煙花，『澎』一聲，擴散快、範圍廣。而佔中是個壓力鍋，先將蒸氣慢慢積聚，再等待爆發的一刻。」

戴解釋台灣學生因反對服貿而佔領立法院，各地示威群眾也前往支持，才令佔領行動演變成全國性的學運。但他強調佔中需要先累積更大的「雷聲」，目的是讓政府正視香港市民要真普選

的訴求，而佔中行動只是「最後一步棋」。

學生捍未來 堅守非暴力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令外界看到了台灣學生群策群力、營造氣氛的能力。兩位學運總指揮林飛帆、陳為廷更被視為「領袖人物」，他們分工仔細，令佔領運動有條不紊地進行。

回顧香港近年類似的學運，就是反國教運動。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透過示威、遊行等行動，引起公眾關注國民教育的議題，成功迫使政府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延遲三年推行。而黃之峰的出現、「學民思潮」的成立，令本港學生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度逐漸提升，參與度增加。

港台青年組織「看見香港」成員陳彥霖，曾代表香港《壹週刊》進入台灣立法院訪問林飛帆及在場同學，他認為新生代的港台青年，對生活地方的認同感強烈。而台灣年輕人因成長在經濟增長的年代，承受的社會壓力較上一代輕，容易對生活產生舒適感，因而變得保守，不想經歷變動。「但（他們）眼看自己的土地被政府或其它因素（霸佔）卻無力可做，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會逐漸激起（他們）討論或參與。」



■黃浩銘希望香港可以學習太陽花運動的抗爭精神，不要認為選擇違法抗爭就是暴徒。（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除立法院內設置媒體區發放即時訊息，場外亦有團體設立資訊區。（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網絡圖片

陳彥霖舉例在佔領立法院期間，有翻譯人員、醫護人員、律師等民眾到會場支援，更設立直播頻道向外界發放即時消息。張秀賢也表示台灣社運的公民自發組織性高，而港人是依靠相關組織發起及領導，才會參與社運。以香港電視發牌風波為例，港視員工組織成了整場運動的領導者。

港抗爭意識弱 社運需有承擔

社會民主連線內務副主席黃浩銘直指香港大部分民主派議員太保守，不願意犧牲仕途去組織違法的抗爭，導致本土抗爭意識較薄弱。「台灣的（領導人）願意以血汗去抗爭，現任高雄市市長陳菊，連副總統呂秀蓮都坐過監，香港除了『長毛』那些，民主派誰坐監？」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坦言，香港的政治氣氛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甚至對香港政治前景感到絕望，從而對政治愈發冷感。

陳彥霖指太陽花運動的成功歸於「大家幫

忙」，他認為運動的展開需要有人號召，更需要有人願意站出來承擔責任。「林飛帆、陳為廷現在已經有十多條官司，但仍需要整個社會的動員參與及支持。」

港教育重成績 台政府懂認錯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鄭宇碩分析自殖民時期以來，香港教育強調成績為重，成績好才能考進好大學，找到好工作。「大公司的招聘從不考慮你有沒有參與過社會運動了，那學生還會去花時間參與嗎？」他指香港屬競爭型社會，工時長、假期少、壓力大、薪酬低，港人難有空餘時間參與社會運動。相反，台灣社會的工作環境不像香港「爭分奪秒」。

張秀賢直指台灣的國民教育比香港做得好，台政府願意認錯，會在監獄、勞改的地方設立民主園區，紀錄政府以前的過錯，讓市民記住歷史，成為新一種國民教育。「香港正正缺乏這樣『活生生』的國民教育。」



網絡圖片

港青年多為『鍵盤戰士』

陳偉業指，香港學生多在網上表達不滿，「由『鍵盤戰士』變成社運參與者又有多少？為何在香港搞社運往往難以動員？」張秀賢補充，香港面積較台灣小，交通便捷令參與社運的人「易來易散」，運動的持續性低。

陳彥霖亦有感港人的生活步伐較快，較少對議題有深入思考和討論。「高登討論區好熱鬧，Facebook社運群組多Like，但通通無法轉換成具體的政治力量。」陳相信香港社會有資源跟經驗，透過公眾對政治議題的的思考辯論加強，組織如太陽花一樣的社運。

他同時提到，近年香港的本土意識增加，越來越多年輕人參與社運行動，但受到來自中國因素等原因，令港人的『放棄抗爭』心態亦逐漸浮現，「就像是『不要抗爭，抗爭沒有用』的感覺。」他直言，社會可以不要抗爭，但不能沒有對話。



■鄭宇碩認為港台的歷史背景差異是影響兩地社運發展的主要因素。（張馨文攝）



■張秀賢表示香港缺乏一個肯認錯的政府。（張馨文攝）

台民主歷程長 社運土壤肥沃

回顧台灣歷來民主運動歷史，堅持抗爭、百折不撓是他們的核心。1895年至1945年間經歷「日治時代」，蔣渭水、蔡培火、林獻堂等人組織、參與文化協會及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發起多次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彰顯對抗日本殖民政權的抗爭光芒。1948年國民黨政府統治初期，政府大規模逮捕及槍決學生爆發了「四六事件」，至中壢事件後，黨外運動開始重生，發動新一輪民主運動。

1949年底，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撤至台灣後，國民黨執政，以穩定及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為由，持續在政治與社會方面對人民實行高壓統治，無數反對者受到迫害。但在高雄事件和美麗島大審之後，經過有志之士的犧牲和抗爭，喚醒民眾對民主的需要。「野百合學運」、推動總統直選等行動，讓台灣民主運動帶來真正的政制改變，逐步讓民主文化生根、發芽、成長。

鄭宇碩指台灣充滿「悲情」的歷史背景使台灣人對政治投入感較強烈，兩黨輪替亦令人民有更清晰的政治立場，所以台灣人的政治參與度一直頗高。鄭追溯台灣歷史說，國民黨時代的台灣人會接受反共教育，同意國民黨政府政治理念的人會選擇從政，加入國民黨或「反共救國團」等的組織，而國民黨也鼓勵人民參與由黨組織的社區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台灣人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極為不滿，埋下了社會抗爭的種子。

而台灣的兵役制度，即18歲以上的男性都必須服兵役。鄭解釋「當兵」無疑加強了他們對台灣的認同感，使他們願意為國家付出。相反，香港人有很強的逃避心態，「安全筏是港人的安全筏。香港大部分人持有外國護照，特別是中產。香港出事，他們會覺得大不了就移民。」

註冊報紙一二四二號

第四十四卷 2014 年第八期「六四」廿五周年特刊

督印人 郭中實

顧問 杜耀明 黃天賜

總編輯 姚文基

副總編輯 黎婉嫻 譚嘉意 林樂軒

「六四」特刊總編輯 莊禮傑

「六四」特刊副總編輯 黃靜薇 黃雅盈 黎明芝

「六四」特刊排版編輯 李慧筠 鄭慧敏

工作人員 鄭秋玲 黃樂宜 何寶儀 黃雅婷 陳展希 葉考欣 陳家恩 李慧妍
文羨怡 張馨文

出版及承印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

出版及承印地址 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

電話 3411 7461

傳真 3411 5079

網址 <http://sanpoyan.journalism.hkbu.edu.hk>

社交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sanpoyanpage>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刊物